

中 / 国 / 传 / 统 / 文 / 化 / 知 / 识 / 小 / 丛 / 书

ZHONGGUO
CHUANTONG
WENHUA
ZHISHIXIAO
CONGSHU

35

四大古典戏剧 佛教

吉林人民出版社



2

5

《中国传统文化知识小丛书》

编委会

主 编	胡维革	
副主 编	陈立忠	胡晓岩 郝国昆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列)	
	于晶娜	田毅鹏
	厉永平	李书源
	陈立忠	陈虹妮
	周玉和	郝国昆
	胡晓岩	胡维革
	赵永春	程舒伟
	雷 庆	颜震华
	魏克威	
责任编辑	刘慧杰	

前 言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凝结着炎黄子孙改造世界的辉煌业绩，包含着华夏先哲的无穷智慧，是先民留给今人的一份极其丰赡、弥足珍贵的宝藏，是人类文化宝库中一朵璀璨的奇葩。今天，如何使这一东方文化瑰宝为当今世界所用，使其为振兴中华、实现四化大业服务，是当代国人学子肩负的神圣责任。对于青少年学生来说，如何继承这份珍贵的历史遗产，接受中华民族优秀统文化的熏陶，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把自己培养成为社会主义“四有”新人，以肩负起两个文明建设的历史重任，更是时代赋予的宏伟重托。为此，我们编写了这套《中国传统文化知识小丛书》。

这套丛书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具体文化事象立题，共选择100种文化事象，每两种文化事象为一本，共50本。在具体操作上，我们力求内容科学准确，文字潇洒飘逸，风格新颖别致；既注重传统文化的历史价值，又着眼于现实借鉴和运用；既写清每一种文化事象的来龙去脉、历史沿革、目前状况、文化蕴含，又将与此事有关的传说、故事、诗文、人物等囊括其中；夹叙夹议，文史交融，妙趣横生。总之，我们期望这套丛书能够起到弘扬中华民族精神、传播传统文化知识、宣传典雅、崇高、真善美的作用，对广大读者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

面对浩瀚的中国传统文化，我们这套小丛书只能说是在海

边采撷了几个小小的贝壳，远谈不上包罗净尽、解说确当，更不待说尽其精要、毕发奥旨了。为此，我们真诚地希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教，以期日后有以改正提高。

编 者

1998年1月1日

目 录

四大古典戏剧	(1)
一 一部风靡了七百年的杰作	
——《西厢记》	(1)
二 妙曲天下传	
——《牡丹亭》	(11)
三 唱不尽兴亡梦幻	
——《长生殿》	(24)
四 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	
——《桃花扇》	(32)
佛教	(44)
一 释迦牟尼与佛教的创立	(44)
二 佛经东传及译经四大家	(49)
三 教外别传的中国禅宗	(54)
四 藏传佛教与活佛转世	(59)
五 寻幽探微话寺塔	(64)
六 佛教四大名山拾趣	(74)
七 话说僧人的衣食住行	(80)
八 佛教法会与节日	(84)

四大古典戏剧

中国戏曲是世界上具有悠久历史和独特风格的戏剧艺术之一，它已经形成了自己民族的独特的完整体系。中国戏曲广泛调动了诗词、小说、舞蹈、武术、杂技、滑稽、音乐、绘画、雕塑等各方面的表现力，融于一炉。中国戏曲有两万多个戏曲剧目，题材广泛，体裁多样，既有历史故事、神话传说，又有民间生活的写照；既有悲剧、喜剧、正剧、闹剧，又有悲喜剧，相当一部分无论思想性和艺术性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而王实甫的《西厢记》、汤显祖的《牡丹亭》、洪升的《长生殿》、孔尚任的《桃花扇》等4部作品，影响最广，成就最高，堪称人类文化宝库中光彩夺目的珍品。

一 一部风靡了七百年的杰作

——《西厢记》

旧时代有句俗话，叫做“少不看《西厢》，老不读《三国》”。意思是说少年时血气方刚，戒之在色，故不宜看专写逾墙偷情

的《西厢记》；及至老来，谄事渐多，世故日深，读了《三国演义》便很容易变成奸滑的人物。这两句老式的格言，从反面让我们了解到这两部古典文学名著对中国人的巨大影响。

“西厢”故事的本源，来自唐代元稹的传奇小说《莺莺传》。《莺莺传》是一部爱情悲剧，主要人物张生和莺莺与后来王实甫剧作中的人物有很大的不同。小说中的崔莺莺，深受封建礼教的熏陶，是一个感情丰富而优柔寡断的少女。她渴望爱情，当爱情蓦地来到她的身边的时候，她却板起面孔教训张生的“非礼之动”。当她意识到张生要抛弃自己的时候，口无一言，自怨自艾，写诗叫张生“还将旧来意，怜取眼前人”。而《莺莺传》中的张生更是一个令人生厌的无行文人的形象。他对莺莺“始乱之，终弃之”，是一个为了功名利禄而可以放弃爱情的封建士子。作者还对张生抛弃莺莺大加赞赏，称许他是“善补过者”。

元稹的《莺莺传》在唐人小说中并不是名列前茅之作，但是它在文学史上却颇负盛名，如鲁迅所说：“其事之振撼文林，为力甚大。”“影响甚大”之原因，主要在于它首创崔张恋爱故事，成为后来千古名著《西厢记》的源头。著名诗人晏殊、苏轼、秦观以及毛滂、赵令畤等都在诗词中写到崔张恋情。

中国诗歌批评史上有“李杜优劣论”的争执，中国戏曲批评史上也有“董王优劣论”的齟齬，可见董解元所写的《西厢》价值不可小看。

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又称《西厢记弹词》、《弦索西厢》。董解元是金章宗时期一位通俗文艺作家。由于缺乏记载，连他的名字都无法确切知道。按唐朝的制度，由乡而贡叫“解”；后世称乡试为“解试”，称乡试第一名为“解元”。但金、元时代，凡读书人都可以叫解元，所以董解元不一定有什么功名。

董《西厢》是一本用诸宫调演唱的说唱文学作品。董解元不但把3 000字的《莺莺传》扩大成5万字的作品。而且给崔张故事以崭新的面貌。董《西厢》所作的根本性改动，首先是改变了《莺莺传》原作“始乱终弃”的悲剧性情节，并且以崔张偕相出走获得美满团圆为结局。这就不但把原作那些“善补过”云云的腐臭陈言一扫而光，而且大胆肯定崔张爱情关系，从幽期密约直到双双出走，都是封建礼教所不能容许的。而董解元却同情他们，赞许他们。其次是对张生的形象作了根本性改变。张生在董解元笔下成了一个有情有义的可爱书生，通过闹道场、月下联吟、害相思、出奔团圆等情节场面的描写，表现了张生对爱情的矢志不渝。董《西厢》的艺术成就，为王《西厢》优美动人的风格奠定了稳固的基础。

《西厢记》的作者是谁？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有的说是王实甫，有的说是关汉卿，还有关写王续说，王写关续说等。元朝钟嗣成《录鬼簿》把《西厢记》列在王实甫的名下，这是关于《西厢记》作者为王实甫的最早记载。明初人朱权的《太和正音谱》有王实甫作《西厢记》的记录，而贾仲明给《录鬼簿》中82名作家补写吊曲，在吊王实甫的《凌波仙》曲中说：“新杂剧，旧传奇，《西厢记》天下夺魁。”进一步肯定了《录鬼簿》的记载。

鲁迅先生曾说过：“小说和戏曲，中国向来是看作邪宗的。”因此，小说和戏曲的作者们大多不见经传，资料短缺，这就为研究他们的生平事迹造成了极大的困难。王实甫也不例外，对于这样一位伟大的作家，直至今日我们连他的生卒年代都无法确指。仅仅知道王实甫生活的时代约略和白无咎、冯子贞相当，主要活动时期在元成宗贞元、大德年间（约1295—1307年）。

《西厢记》杂剧大约作于元成宗大德三年至十一年（1299—1307年）之间，对于他一生的行止事迹，亦所知甚少。我们只知道他名德信，大都人，做过官，后来辞职居家，至少活了60岁。贾仲明追吊他的《凌波仙》写道：“风月营密匝匝列旌旗，莺花寨明晃晃排剑戟，翠红乡雄赳赳施智谋。”

“风月营”、“莺花寨”、“翠红乡”，都是指元代官妓聚居的地方。元代的官妓也就是杂剧的演出者，官妓聚居的地方，也就是演出杂剧的“勾栏”。元仁宗（1312—1320年）以前，因为停止科举，许多穷苦的文人靠给“勾栏”编写杂剧维持生活，王实甫与当时的勾栏歌妓有着密切关系，他文采风流，才华四溢，又深为“士林”钦敬。王实甫的著作，《录鬼簿》中记载了12种，《太和正音谱》中记载了13种，还有人认为共有14种。其中《西厢记》是王实甫的代表作。

《西厢记》的故事，展开在一个静谧、清幽的美好环境里。宋元以来，由于理学盛炽，社会上男女青年是极少有可能交往和接触的。热烈企盼着婚姻自由的男女青年，总是以侥幸的心理期待着某些偶然来到的交往机会。王实甫为他所喜爱的莺莺和张生设计了偶然相遇的地方——那里香烟缭绕，钟磬声声，于是便有了“佛殿惊艳”。相国小姐崔莺莺扶父亲灵柩返回故里，因路途不靖，暂与母亲寓于寺中；而洛阳秀才张君瑞则是赴京应考路过，二人一相遇，莺莺便“临去秋波那一转”，而张生竟立即决定：“小生便不往京师去应举也罢。”只一见，只一眼，二人便把一腔的情义注入对方身上。

莺莺与张生相恋显然在门户相对的封建社会是不可能实现的，但王实甫偏偏要实现给人们看。因此，他只能求助于奇迹般的相遇了。这个奇迹般的相遇，就是孙飞虎的降临。流氓武

夫孙飞虎垂涎崔莺莺的美貌而发兵包围普救寺，莺莺的母亲为解决这种危急，同意了自己女儿的提议，当众宣布，谁能退得贼兵，就把女儿嫁给谁。张生挺身而出，先赚孙飞虎后退，等待3日，接着写信给同学白马将军，请他前来援救。白马将军立刻率军打退孙飞虎，普救寺因而解围。

但是，莺莺的母亲老夫人推翻了以前的诺言，赖掉了应许的婚事，却让莺莺以哥哥之称拜谢张生解围之恩，这使张生和莺莺都很不满。他们已经趋向无法遏止的热恋高潮。由于老夫人治家很严，监视很紧，遂使他们分离两处，相思日苦，几如大病。在丫环红娘的帮助下，莺莺终于冲破了各种阻拦和束缚，暗地里与张生同居了。

事发之后，老夫人拷问红娘。红娘把事情全部说出来，并说这完全是老夫人失信赖婚之过。老夫人恐怕经官会把此事张扬出去，有辱相国门庭，无奈使莺莺和张生成了婚事，但要求张生立即赴京应考，若考试不中，也休想回来见她。张生只得离别了莺莺，去京城应考。张生一举便考得状元。正要回来，这时崔相国生前许下的女婿郑恒却来讨娶莺莺，并说张生又做了尚书家的女婿。张生回来后，揭穿了郑恒的谎言，郑恒触树而死。在白马将军的庆贺中，张君瑞和崔莺莺终得团圆。

在这段终得团圆的爱情故事中，有几个段落已成为舞台上的经典场面。

第三本第二折《闹简》是全剧著名的场子之一，现在大学中文系课堂上讲授《西厢记》，就常把它当作“麻雀”来进行重点解剖。这一折写寺警围解，老夫人悔婚，崔张坠入了无穷的相思之中，这时红娘建议张生月下弹琴以试莺莺之心。《听琴》后，莺莺通过红娘向张生说“好共歹不着你落空”，但只有言语，

不见行动，张生于是相思成病，他趁红娘前来问病的时候，托她带一个简帖儿给莺莺。《闹简》的情节，就是围绕着这个简帖儿来展开的。

围绕剧情规定中的某一道具来编织戏剧情节，这是我国戏曲剧本一种传统的编剧手法。有全本皆用一道具来贯串的，如《荆钗记》中王十朋聘下钱玉莲之荆钗，现代戏曲《红灯记》中之红灯。至于某一场子用道具引发以编织故事则更常见，如《珍珠记·书馆悲逢》一场中扫窗用的小扫帚，《白兔记·井边会》中的白兔，《琵琶记·描容上路》中的琵琶等皆是。由一件道具引发故事，编织情节，使戏剧冲突紧凑集中，这是《闹简》编剧上最引人注目的成就之一。一个简帖儿，看似微不足道，实则干系重大，因为它沟通了崔张两人的情愫，爱情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红娘手中的简帖儿。因此张生说“简帖儿是一道会亲的符箓”，这虽是可爱的，却并不虚妄。

戏一开场，当红娘走进莺莺的闺房，以〔粉蝶儿〕一曲，从室外写到室内，展现了一个优雅而寂静的环境。这一环境，既恰切反映了莺莺这个相国小姐的身份，又形象地映衬出此时此境莺莺内心孤寂的哀愁。所以接着〔醉春风〕曲，就由莺莺外在的静态写到动态，“钗亸玉斜横，髻偏云乱挽”，头发散乱，首饰不整，懒洋洋闭目高卧不起，这是静态描写。半天才勉强抬起身子坐起来，却又是“几回搔耳，一声长唉”，这是动态勾勒。透过这一外在的形态，流露出莺莺此时内在的感情——为爱情而苦闷悲伤。而且曲中插入红娘一句带有既爱怜又揶揄的表态：“日高犹自不明眸，畅好是懒、懒。”这又透露出红娘性格的机伶和幽默，正因此，她不把张生的信直接交给莺莺，而是把信放在妆盒上，自己从旁观察莺莺见信后如何表现。此时，红娘

看到莺莺的反应是：“晚妆残，乌云鬓，轻匀了粉脸，乱挽起云鬟。”本来准备梳妆打扮，忽然却只草草搽了一下粉，匆匆忙忙挽起乱发就了事。通过莺莺这一外在动作，传神地揭示了她一见到信就迫不及待，急于一睹的紧张心情。她忙放下了妆盒，又拿起了简帖，“开拆封皮孜孜看，颠来倒去不害心烦”。“孜孜看”，表现出全神贯注；“颠来倒去”地看，又足见此信有多大的吸引力，使其不忍放下，百读不厌。真是见信如见人，喜不自禁！此时莺莺心中爱情的波涛激荡翻腾，已通过她的外在表现，明显地坦露出来。而当她意识到红娘站在自己身边时，自己如此喜形于色，不是在自我暴露吗？于是莺莺发起怒来，声称要“告过夫人，打下你个小贱人下截来”，表面上气壮如牛；红娘毫不示弱，说：“姐姐休闹，比及你对夫人说呵，我将这简帖儿去夫人行出首去来。”莺莺立时吓得面目改色，马上陪笑脸说：“我逗你要来。”“要红娘说说，张生两日如何”，气氛又一变，变得舒徐轻松点了。但莺莺听后明明内心也动情，外表却仍一本正经，强调自己与张生的关系只是“兄妹之礼”而已。红娘当然毫不客气，冷言相讥，揭穿底细。但“心肠儿转关”的莺莺，耍出了绝妙的一手，她写了一封信，掷书于地，板起脸孔对红娘宣称：“红娘，你将去说：‘小姐看望先生，相待兄妹之礼如此，非有他意，再一遭儿是这般呵，必告夫人知道！和你这个小贱人都有话说。’”这一下把红娘也愚弄了，使她信以为真，顿时引起红娘的气愤，以为莺莺对张生的爱情又变卦了。所以一连用了五支曲子极尽发泄其对莺莺的不满，揭穿她“对人前巧语花言；——没人处便想张生；——背地里愁眉泪眼”的自欺欺人的矛盾表现，并为张生大抱不平，为其相思痛苦深表同情。这些曲词，使我们透过张生外在的瘦损，领会到其内在

的痴情；透过莺莺外在装假，看到她内心的执着；透过红娘外在的牢骚，理解到她满怀的火热心肠。

红娘带着莺莺的信来见张生，张生第一句话就是问明大事如何，红娘直截了当地回答他：“不济事了，先生休傻！”张生一听，却埋怨起红娘“不肯用心”，使红娘十分委屈。这个书呆子不够体贴的话语叫她生气，她要张生“早寻个酒阑人散”，把事情收歇算了。可是，张生如今只有红娘这个贴心人了，好事是否成就仅有此一线希望，他又跪又哭又闹，热心肠的红娘于是记起小姐还有一封回书，把它递给张生。此信一出，顿时“柳暗花明又一村”。张生一看，喜不自禁，口若悬河，手舞足蹈，他不禁对红娘说：“小娘子，和你也欢喜！”让红娘这位知心人也分享一下眼前的快乐吧！于是红娘如梦初醒，不过她还是将信将疑，“他着你跳过墙来，你做下来，端的有此说么？”这才引起张生大谈自己是“猜诗谜的社家，风浪隋何，浪子陆贾”的话来，张生高兴得太早了，他太纯洁率真了，没有料到事情还会起变化，因此在下面《赖简》一折，他这些所谓“猜诗谜的社家”的话语，很快就成为红娘打趣他的笑柄。就这样，一个小小简帖儿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矛盾交叉重迭，戏情千姿百态，场面变化无穷，人物活龙活现，观众的心就颠簸起伏在剧情的波浪尖上，忽高忽低，进入一个奇幻无穷的艺术世界。

王实甫在《西厢记》的最后提出了“愿天下有情人成眷属”，这或许就是王实甫本人创作《西厢记》所要表达的心声。王实甫是一位与“风月营”、“莺花寨”、“翠红乡”有着密切交往的戏剧家，有许多儿女之情的故事，为他提供了创作的题材。从《西厢记》中可以看出，他对于生活中恋爱婚姻的悲喜剧有着明确的态度：他赞美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而反对以“父母

之命、媒妁之言”为基础的婚姻。在他看来“有情的”结成婚姻才是美好的，值得赞美的。

但是，“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在王实甫那个时代，只能是一种理想。这种理想，不仅在王实甫的时代不能实现，即使在《西厢记》产生以后多少个世纪也还不能实现。

但王实甫毕竟喊出了一句让世人愕然的奇音。统治者把《西厢记》视为洪水猛兽，一再明令禁毁。清乾隆年间，最高统治者明确谕示内阁：“……近有不肖之徒，并不翻译正传，反将《水浒》、《西厢记》等小说翻译，使人阅看，诱以为恶。……如愚民之惑于邪教，亲近匪人者，概由看此恶书所致，于满洲旧习，所关甚重，不可不严行禁止。”最高统治者是如此，地方各级官吏当然更要效法。道光年间，浙江学政于省城仙林寺设局，收毁所谓“淫书”，在毁禁书目中即有《西厢记》。在此前后，苏州也设局毁淫书100余种，并板结20余种，照例也包括《西厢记》在内。诸如此类，真可谓是不一而足。但是，封建统治者越是三令五申，“严行禁止”，《西厢记》就越是以其旺盛的生命力，在社会上不胫而走，广泛流传。

《西厢记》到了一般文人学士那里，背景便有些不同。一方面是具有正统观念的封建文人特别是道学家的诋毁和诽谤，一方面却赢得了许多非道学家特别是进步文人的欢迎和赞赏。“《水浒》倡乱，《西厢》诲淫”，这是明清以来许多笔记小说所一再重弹的滥调，特别是《西厢》，更被视为“淫书之尤者，不可不毁”。不仅如此，他们还不惜伪造证据，说是在明成化间魏县居民于废冢中得到了一块崔莺莺和她丈夫郑恒合祔的墓志铭，云崔氏如何“四德兼备”，“与郑府君白首相庄，生六子一女”，以此证明《西厢记》所写“悉诬”。更有甚者，还编造了

诸如《西厢记》作者王实甫如何“嚼舌而死”，如何被打入阿鼻地狱永不超生的离奇谎言。清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中就有这样一条记载：因为王实甫和汤显祖“口孽深重，罪干阴谴”，有人到过冥府，见到两个人被囚于阿鼻狱中，问他们是谁？鬼卒回答道：“这是阳世作《还魂记》和《西厢记》的，他们永世不能超生。”这种恶语狠毒的诅咒不仅针对了《西厢记》作者，而且包括了推崇过《西厢记》的文人学者。总之，《西厢记》既是“淫书之尤者”，那么它的作者、译者、刊刻者、推崇者也都不会有好结果。

与上述情形完全相反，历史上一些非道学家和进步文人，则给了《西厢记》最高的评价。明代有人或说“北词以《西厢记》为首”，或云“《西厢记》为传奇冠”、“独戏文《西厢》作祖”，都把《西厢记》奉为我国古代最优秀的戏曲作品。在文学创作和艺术实践领域内，我们也可感受到《西厢记》的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从明代到清代，各种地方戏曲大多编演了这个剧目，并在说唱、剪纸、泥塑、牙雕、绘画等各种艺术形式中，形成了一股持久的“西厢热”。

《西厢记》对青年男女的思想影响更是直接而巨大。清余治《得一录》里记载了这样一个传说：“金陵一名家子，过目不忘，十三岁时，博通经书史册，有一天偷看了《西厢记》，便废寝忘食连看七天，就这样看死了。”这段记载当然不足信，但它所说这位青年看《西厢记》看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应是可信的。

此外，《西厢记》的影响还渗透到人类生活的其他角落，甚至以标榜色空为主旨的和尚寺院里。明冯梦龙所编《古今谭概》里收了这么一个故事：明朝一个士人叫丘琼山，生平好游名山大川，一次经过一座气象庄严的古寺，便进去瞻仰一番。当

他走进佛殿，不禁暗暗吃惊，原来四周墙壁上画满了一幅幅《西厢记》的图画。他顺手拉过一个老和尚问道：“这些都是情男痴女的肮脏行为，出家人怎么能挂这些丑画？”老和尚合掌道：“相公有所不知，咱们僧人就是从这里面领悟佛学真谛的。”丘琼山愈发惊奇了，问道：“真谛？！这些是从哪里领悟的？”老和尚回答道：“《西厢·惊艳》中，张生不是唱道：‘怎当她临去秋波那一转’么？酒家便是从这里悟禅的。”看来这个寺里的和尚是属于禅宗一派的，因为佛教中惟独禅宗主张禁欲不是同一切物质外界隔绝，而是要求在同外界的充分接触中去锻炼身心，做到“见色不乱”，“无所住心”。这个故事从一个侧面透露了《西厢记》无孔不入的渗透力。

要而言之，《西厢记》是我国艺术宝库中一颗璀璨夺目的明珠，堪称是一部名副其实的“奇书”。

二 妙曲天下传

——《牡丹亭》

《牡丹亭》（全名《牡丹亭还魂记》）传奇完成于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秋，系以话本小说《杜丽娘慕色还魂》为蓝本而创作的。

作者汤显祖是我国明代伟大的戏剧家和文学家。

明代嘉靖年间，横跨江西抚川府临川县东汝水（抚河）的文昌桥，连接着城内和城外。桥西属城内，地势奇拔，府衙学宅点布在五峰之间。沿河自北而南，街衢纵横，人丁密集，是赣东六县的政治经济中心。桥东即文昌里，已属城外，这里地势平坦，水美田

肥，是抚河三角洲的一片冲积地带。千金堤、正觉寺都坐落在这绿洲之内。就在这风物绮丽的文昌里，在东井的西面，关帝庙的南端，有一幢古老的住宅，宅门两旁镌着一幅对联：

北垣回武曲，东井映文昌。

这就是汤家的老屋。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八月十四（公历9月24日），汤显祖在这里出生了。

汤显祖幼年时，生得眉目清秀，聪慧活泼，见者无不啧啧称赞。他的家庭是书香门第，祖上四代都有文名，父祖辈们除嗜书喜文外，还有一个共同之点，就是酷爱戏曲歌艺。祖父是弹琴高手，伯父深通琴理，父亲也是一位戏曲鉴赏家，仅珍藏的杂剧剧本就有上千种，汤显祖熟读元人杂剧，随口都能背诵其中的佳句。这使他自幼就养成了对戏曲艺术的爱好。

隆庆四年（1570年）秋，博学多才的汤显祖参加了南昌的乡试，主考官赏识他作的八股文，录取他为举人，名列榜上第八名，但汤显祖对束缚思想才情的八股文并无多大兴趣。中了举人后，他的注意力便集中于韵语，写下大量的诗赋，并积累成册。当时，邻县金溪浒湾镇的书铺街，以刻版印书著名于世，一度拥有书坊60余家，刻印工匠1000多人，刻工高超，印刷精美，出版的书籍畅销全国各地，素有“临川才子金溪书”的美誉，这也为汤显祖早年出版自己的诗集提供了方便。他26岁时，就刊行了第一部诗集《红泉逸草》，两年后，又编印了另一部诗集《雍藻》，当时徐渭在读了汤显祖的《问棘邮草》之后，大为赏识，在卷首批道：“此牛有万夫之稟！”可见汤显祖在他的青年时代，就已在文坛赢得了盛誉。